

DAOJIA SIXIANG YU HANWEI WEN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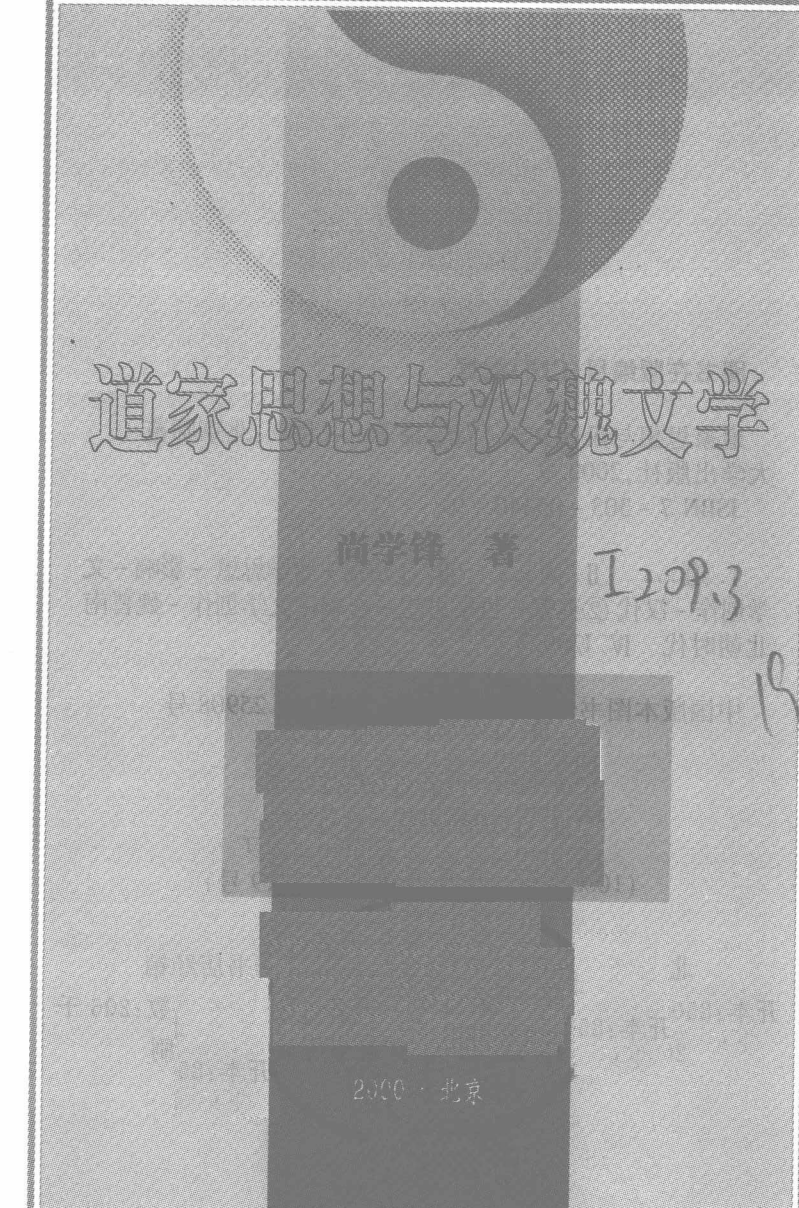
尚学锋 著

道家思想 与 汉魏文学

神赋第一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

尚学锋 著

I209.3

19

2000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尚学锋著.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9

ISBN 7-303-05340-9

I. 道... II. 尚... III. ①道家-哲学思想-影响-文学创作-汉代 ②道家-哲学思想-影响-文学创作-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2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908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2.375 字数:206 千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定价:18.00 元



· 聂石樵

尚学锋同志撰写的博士论文《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即将出版了。我十分高兴，愿意乘机为之写几句话。

学锋同志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毕业当年考取本校中文系古代文学硕士生，取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不久，又考取了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主攻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一九九五年取得博士学位。学锋同志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期间，他不仅承担着教学任务，而且还负责中文系一部分行政工作，集学习、教学、工作于一身，任务之重可以想象，然却以顽强、坚韧不拔的精神出色予以完成。在撰写博士论文《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回顾近些年来，研究魏晋时期玄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关于魏晋玄言诗的论著很多，学锋同志这篇论文与这些论著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上起西汉，下至魏晋之际，集中论述道家思想的流行、演变及其与文人思想作风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道家思想与文艺思潮的变化，并分别从不同的文体分析不同历史阶段道家思想对

文学创作的影响。这都是其他著作所未曾涉及的，而是学锋同志在这领域的新开拓。

学锋同志长于探讨问题、分析问题，如对道家思想对散体赋创作方法的影响，道家思想对文人五言诗由表现娱乐感慨人生，由缘事到言情の変化以及汉晋之间华丽文风与道家思想的关系等，都经过认真地探讨、分析，得到了有独创性的见解。他还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问题，把社会现象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如把汉魏时期道家思想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之内涵和特征，都作了准确的概括，给予这一历史时期道家思想以科学的评述。

学锋同志的论文，通过答辩并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并未就此止步，而仍在继续增补、加工，到目前脱稿，前后经过八九年的时间，其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之精神，俱见之于论文之中。

我与学锋同志同事多年，作为他三年多研究工作的见证人，书写以上几句话，一者说明学锋同志的刻苦钻研精神值得学习，一者向读者推荐这是一部好书，应当认真阅读。

1999年9月8日

引 论

顾名思义，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道家与汉魏文学发展的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一时期，那飘逸潇洒的文人风度、璀璨夺目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绩，都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而彪炳史册。本世纪以来，研究者更是把魏晋当作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予以高度重视。正如一颗果实的成熟需要孕育和生长的过程一样，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此之前，中国文学经过长期的发展，才终于在汉魏之际，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曹丕的时代”，敲开了文学自觉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两汉至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独立的文人群体的出现、文学观念的演进以及创作的发展，都为文学走向自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深远影响，而在汉末至魏晋之际文学向自觉转变的过程中，则是道家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道家思想也并非只是到了汉末魏晋才对文学产生影响，事实上，两

汉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与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发展到汉晋之际，其影响终于超过了儒家而导致了文学自觉局面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道家思想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并以不同的方式及内容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可以说，在道家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中，两汉时期是第一个重要阶段。目前，学术界普遍比较重视道家思想对魏晋文学的影响，但与此相比，对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的关系，则显然研究不够。例如，人们大都认为，汉代流行的道家思想主要是黄老思想，庄子思想在社会流行并对文学产生影响是从汉末才开始的。但实际上，早在西汉前期黄老之学盛行之时，《淮南子》中就大量吸收改造了庄子的学说；西汉后期，严君平作《老子指归》，更是以庄解老。而东汉后期老庄思想的盛行，则可以上溯到两汉之际。这一时期道家思想的抬头，又是与儒学复古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它在东汉中期即形成强劲的势头，最终导致了汉末的率情任性、不拘礼法的社会风尚。又如汉代文人往往从贵生的角度去理解和接受道家思想，他们渴望获得个体生命的安全与自由，希冀延长生命，追求物质享受与精神快乐，由此而导致了养生与神仙思想的盛行，导致了肯定情欲与个性、狂放不羁、蔑弃世俗的思想行为，这一切都为魏晋的士风开了先声。至于道家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具体联系，在不同时期、不同

的文体中也各不相同。例如就汉赋的创作而言，在散体大赋中，主要是道家连类而及、追求无限的思维方式和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方法；在表现不遇之情的赋作中，则是老庄的人生态度与神仙思想影响了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到了汉末，则是以老庄学说为内核的主情思潮的兴起，推动了赋的创作走向表现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感性生活；而魏晋之际，又由庄玄的盛行导致作品中批判意识的增强与富于玄学色彩的艺术境界的出现。在诗歌领域，道家通脱任情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到汉末文人五言诗的出现及其创作特色；道家尚自然真情、重个体生命的意识、关于心物关系的思想及其对神仙之说的改造和利用造成建安诗歌咏叹人生、感物抒怀的特征并引起游仙诗的变化；庄玄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则赋予阮籍、嵇康诗歌生命关怀的主题和宅心虚阔的境界。在散文创作中，随着道家思想在两汉之际为部分文人所接受，老庄的批判意识和生活情趣逐渐注入作品，对扭转文风起了重要作用，终于在汉晋之际引起散文创作的根本改观，形成了通脱、任情与华丽的时代特色。以前人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深入探讨不够，在某些方面认识还较为模糊，实有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本文所论述的对象，上起西汉前期，下至曹魏末年。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文

化整合：一次是西汉前期由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另一次是从汉末开始至曹魏时期完成的经学思潮的衰落和玄学思潮的兴起。在此期间，儒道两家思想相互吸收融合、互为消长，道家学说对文人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最终超过了儒家。到了魏晋之际，也就是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士风与文学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向自觉演变的过程基本告一段落。因此，我们的论述以此为时间下限，目的是为了截取一段较为完整的社会思潮与文学发展的过程。研究魏晋文学如果不上溯到两汉时期，不容易弄清其发生与发展的来龙去脉；相反，如果不了解魏晋之际文学的发展状况，并以此作为参照系统，也就很难把握汉代某些文学现象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考察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本文的观察视角是哲学思潮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总是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作家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以及审美趣尚等方面，进而形成富于时代特征的艺术精神。文学的发展史首先就是艺术精神的嬗变史。这里所说的艺术精神，主要是指建立在一定哲学观点之上的审美理想、文学观念、创作原则、艺术思维方式等等，它们又进一步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及创作手法的发展演变。就道家对文

学的影响来说，主要是其文化精神的核心部分——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对作家的思想、行为及其创作产生重要作用。

道家的思维方式有三个突出特点：首先是它的以把握大道为最高认识目标的思维方向。道家的道具有形而上的特点，它超越时间与空间，代表着无限与永恒，是道家对宇宙的本体和本根的描述。体道，就是在精神上突破时空的局限与束缚，与大道合而为一，从而进入绝对自由的境地。这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同时也极易转化为作家笔下的艺术境界。其次是它的以直觉体悟为主的认知方式。为了把握这“惟恍惟惚”的道，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鉴”，庄子强调“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智”与“得意忘言”。这种体道方式培养了一种超然物外，无所系累的人生态度，一种忘怀一切而与物为春的审美态度。庄子所谓“游心于物之初”，就是对其认知方式与认识目标的形象描述。另外是它的否定型、逆反型的思维特征。道家总是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用一种与世俗相反的目光重新审视一切看上去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善于把常规下认为正确、完美的事物颠倒过来，指出其有限性、相对性，从而加以否定。这种思维方式引导人们突破儒家正统观念与经学思维的僵化和迷信，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贵无论的思想，它

进一步启发人们超越有形去表现无形，超越有限去追求无限，从而引起生活与艺术观念的巨大变革。

道家的价值取向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崇尚自然，二是珍惜个体生命。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二十五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8页）自然，是不加外来干涉的事物的本然状态，是排除主观目的性的不期然而然的状态。法自然，表现在人格理想与人生态度方面，就是反对社会规范的束缚，尊重和保持人的素朴本性；是率情任真、自由不羁，让个性得以充分发展。它导致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形成。表现在审美理想与创作原则方面，就是大胆表现真情，反对雕饰与造作，它一方面使文学挣脱儒家政教文学观的束缚而走向自觉，一方面引导作家追求自然真淳的创作风格。与崇尚自然相联系的，是道家对个体生命的珍视。老子和稷下道家的学说中都包含一些追求长生久视的成分；庄子更是关注人的生存困境问题，热衷于探讨士在现实中如何安身立命；《淮南子》则直接把“保真”与“贵身”作为全书的主旨。从贵生思想出发，道家反对为追求名利功业而伤生害性，他们引导士人疏远现实政治而企慕高蹈隐逸。汉代以后，一些信奉道家学说的人更是把对个体生命的珍视与延长和占有生命的努力结合起来，他们醉心于养生之术、神仙之

说，更追求物质与精神的享乐，从而引起生命意识的高扬和感性情欲的膨胀。

在汉魏文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作用于作家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趋向上，进而以此为中介向艺术精神渗透，并通过其创作显现出来。而这一切，又随着时代变迁而呈现出各异的风貌。

汉魏时期道家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社会上流行的道家思想是黄老学派的观点。这一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递相传授至汉初。据《史记·乐毅传》后的“太史公曰”：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曹相国即曹参，他在汉初为齐国相，向盖公学习治道，“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司马迁：《史记·曹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9页）曹参用以治齐，“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到了惠帝二年，丞相萧何卒，曹参代其为相，于是把黄老学说引入朝廷。

由于其清静无为的主张适应了汉初休养生息的需要，因而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和提倡。黄老之学在当时主要是作为一种“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君人南面之术”而用于政治方面；另外，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保养形神，“欲与天长地久”的成分。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一部集道家学说之大成的著作——《淮南子》，此书是淮南王刘安如集门客编撰而成的。书中全面总结了黄老学派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同时又大量引入在当时不受重视的庄子的思想，阐发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生哲学。《淮南子》的文风闳博巨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汉代散文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曹魏前期玄学出现以前，是汉魏时期道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独尊儒术的实行，道家学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降到了次要地位，直至曹丕称帝之后，才又一次有意识地实行道家的无为之治。但道家思想在此期间一直在社会流行，并表现出一些鲜明特点：一是充分发挥了批判现实的作用。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道家无为思想批评汉武帝的多欲政治，严君平在《老子指归》中抨击独尊儒术，王充以道家的自然之说批判汉儒宣扬的神学迷信，以及东汉中叶以后社会批判思潮中的道家思想等等。二是在黄老思想流行的同时，老庄的人生哲学也开始对士人的思想行为

发生作用，它悄然出现于两汉之际，终于在汉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三是道家的养生之术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并与秦汉以来的神仙思想日益结合，最终导致了道教的生产。四是一些学者在接受和阐发道家思想时，提出了一些富于玄学色彩的观点。如扬雄把“太玄”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以此为核心建造了他的宇宙图式；严君平、崔寔、仲长统等人则提出了近乎“以无为本”的思想。在这一阶段的后期，道家学说已对士人思想行为及其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曹魏正始年间，随着玄学的出现，汉魏道家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玄学的产生与现实政治以及汉末以来的学术思潮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士人慕尚玄远，渴望超脱的精神需求。玄学家们不满意两汉哲学停留在直观经验论的水平，而要求探讨更高层次的哲学问题。他们把汉代哲学的宇宙论转变为本体论，进而提出“得意忘言”的思辨方式。其特点诚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魏晋玄学流别论》中所说：“魏晋之玄学则不然，已不复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从玄学所探讨的基本命题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它是道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最初

有袁宏将其分为三期：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竹林名士”；以裴楷、乐广、王衍、谢鲲等人为“中朝名士”。（见《世说新语·文学》）今人汤一介先生在此基础上将其分为四期，即：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时期；以裴楷、郭象为代表的元康时期；以道安、张湛为代表的东晋时期。正始时期，何晏、王弼等首创玄学，提出有无之辩、名心之辩、言意之辩等玄学的基本命题。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建构了富于玄学色彩的理想人格——圣人。正始时期的玄学，为士人的思想行为和文学创作提供了富于时代特色的理论基础。玄学家浓厚的理论兴趣，反映了士人精神解放的要求，是当时人的自我意识高涨的一个重要表现。到了竹林时期，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进一步把玄学家的理论思考和“越名任心”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塑造了“大人先生”、“宏达先生”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一方面表现出超旷高远、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进而又把它们转变为艺术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玄学思潮的深刻影响。至此，文学走向自觉的进程已告一段落，本书的探讨也将在这里停下脚步，不再追踪此后文学与玄学如何继续携手而行。

道家思想与汉魏文人及其创作，这个题目令人

感到既熟悉而又陌生。它像一个窗口，透过它，我们将看到一个魅力无穷的世界。

目 录

序

序/聂石樵/1

第一章

引论/1

道家思想与汉魏文人群体/1

第一节 精神境界/2

第二节 自然人生/55

第二章

道家思想与汉魏赋作/113

第一节 “赋家之心”的道家文化内涵/113

第二节 士不遇赋中的道家情思/136

第三节 汉末赋风新变与道家人文精神/170

第四节 魏晋之际的赋风与庄玄/197

第三章

道家思想与汉魏诗歌/212

第一节 文人五言诗的兴起与缘情文艺思潮/212

第二节 建安诗歌的人生与艺术趣尚/238

第三节 阮籍《咏怀》的生命关怀和抒情模式/275

第四章

道家思想与汉魏散文/297

第一节 《淮南子》的时代特征/297

第二节 两汉文风演变中的道家之音/326

第三节 道家思想与汉晋之际的文风/344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373

后记/377